

旧 文 新 知 丛 书

不能忘却的纪念

贾植芳著

我的朋友们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不能忘却的纪念

贾植芳著

我的朋友们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贾植芳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6

(旧文新知丛书)

ISBN 7-80646-269-4

I. 不… II. 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755 号

责任编辑:黄 韬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朋友们

贾植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4 字数 122,000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ISBN 7-80646-269-4/I·314

定价:1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作 者 像

而实在。甚至还不如林冲。但话虽是这样说，人生到底是一件事，散商而有意义的事，还是要用鞭鞭的鞭去渡世，故兄的劝勉，小弟乃弟勇气之泉源。小弟想，世界上最美丽的战斗力，就是手执武器站在战场之野的勇士的战斗力。小弟从前读史之中曾真实的看到这种战斗力，衷心曾想：人生到此，可云满足的感到幸福。

若作数篇，即请存足意，不一定非要发表，其中足认为可发表者，就请互随便写个署名，发表之亦可，不发表，任退足，就受可身。陈守梅兄数年不候，不意竟有今日，则通此。

即请：弟弟。

小松青书
九、廿一

佩兄：回到部队接读来信是很久的事情了，但一直未能写信回信，却是因老的问题。现在好了，我明天又要离开这里了，军流的生活又告一个段落了。晚上月明风静，心平如镜，那么就写一封回信吧。真是，下次由提笔作书时，不知又在个什么环境中了。

昨日看大公报上登的文协周年纪念论文，提为笔所执茅，读来真是感情激荡。而又联带的想到是上出半深沉的感慨。一句话：战时中国文士的悲哀，可说是人数性的悲哀。茅数年来深有感受在这痛苦中，没做人家在不容易的一回事，惶惶做有良心的反战了。茅前出曾有，连做一个字都不留的话，因为一个，配合的文士，尖在还不如去卖油榨油。

作者写给胡风的手稿



一九八三年,作者在北京胡风寓所与胡风交谈

序

贾植芳

承蒙上海文化出版社朋友们的盛情与厚爱，愿意将我进入暮年后所写的那些怀念故人与旧友的文章收集出版。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又由我的两位在出版界的青年朋友陈麦青和孙晶忙里偷闲地为我代劳，将我这些年写的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这类文字收集成册，从而成为现在这本书稿。

老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自束发读书以后，扎入社会，我的生存时代正是中国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外寇与内贼交相为祸的时代。我作为一个社会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十年，在各个时代和场合都结交了不少各色各类的朋友。因此，在解放后的档案中，曾落了个“社会关系复杂”的政治结论。雨过天晴之后，我又故态复萌，一如往昔，此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科学与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生性喜交朋友，但绝不滥交。我交友是有选择的，有原则的。古人评价文人用“道德文章”这样的标准，我认为用于现在，也不失其原则的真理性，虽

然,随时世变迁,“道德”与“文章”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才学是第二位的。我交友,首先看他的人品,做人道德,其次看他的才学和能力。最近,我根据自己六十多年来在历史风雨中的人生感受与经验,立足于自己的行业,写了一副对联,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交友观。联曰:

欢迎四面八方中外一丘之貉

谢绝官匪商娼非我族类之辈

横联:寒士门第(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建议我改成“布衣之家”。)

这里的“商”指的是官商、洋商、私商、富商大贾。“娼”非指那些出卖肉体的人,而是那些出卖灵魂,依附权势,为虎作伥的文人,那些恪守做人良知,从事于人类文化创造和知识传承的知识分子不在此列。

我把交友作为自己了解社会和历史的一个窗口和渠道。各类朋友分别带着他们各具个性的社会、文化、人生背景,有其各具特色的人格风采,千差万别的知识背景,多一个朋友,就等于多一份阅历,多读了一本书,多长了一些智慧或教训。自三十年代我从投稿开始进入文艺界,以文会友,社会动荡不定,我的生活也居无定所,结交的朋友极多。那时我交往的朋友,多是“左翼”知识分子。解放初期,新政权建立起来,我转入到高校工作,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一些。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平日结交的多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有些朋友,虽然没有深交,可他们身上的正直人格,过人才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十年代的那场政治风暴,彻底击碎了我那刚刚平静下来的

生活,我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更枉谈交朋友了。我的很多朋友也蒙遭和我同样的厄运,其中多人给折磨至疯、至死。想及这些历史,我的心有一种揪心的疼痛。我作为历史的幸存者,有责任把他们的命运记录下来,我把写这些文字,当作一份庄严的历史使命,一份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这些写我三朋五友的文章,又可分成两种表现形式:一类是人物的专题描写;一类是以序文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些文字里,我不仅仅关注他们的才学与成就,还关注他们的人品与个性。通过记述我与他们的交友史,以及他们各自的命运史,让人们的历史多一份了解。同时,也算是我这个后死者,献与旧友的一束鲜花和几杯清酒吧。总的来看,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史或命运史,以至苦难史,因此我写的是历史。

遗憾的是,这些还不是我要写的全部,我要写的,应该写的朋友还很多很多,这些朋友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们是我生活的支撑,也是我写作的动力,我仍会用我颤抖的手中的笔,将这些历史形诸文字。我还要继续努力,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朋友们。

这里我还想交待一句的是,其中有些文字,尤其是写于九十年代的,因为我年老体衰,便由一些青年朋友代为抄录,整理,这些年轻朋友有陈思和、张业松、汪凌、宋炳辉、刘志荣、柳珊、蔡春华、张涛甫,我感谢他们的真诚与友情。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于上海寓所

目 录

序	1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	1
纪念余上沅先生	16
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	22
悼念施昌东	29
记还珠楼主	36
我的难友邵洵美	42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52
忆覃子豪	59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	76
跨越大海的哀思——悼念日本朋友相浦果教授	82
萧军印象	86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91
迟到的悼念——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朋友卢扬(克绪) 先生	95
一个普通商人之死	101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	105
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	110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116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123
怀念庄涌——《庄涌和他的诗》序	130
忆尚丁	132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	139
忆林同济先生与杨必女士	147
背影——悼念公木先生	152
回忆王中	157
我的三个朋友	162

附：

我眼中的风景——贾植芳先生散记	应 红 172
-----------------------	---------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

前记：今年十月初，我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部长濑在良男教授邀请，偕老伴任敏重游东瀛，回校访问和讲学。本讲稿曾先后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举行的日本中国学会“前夜祭”及日本大学的中国文学会上讲演。两次讲演都是由日本大学今西凯夫教授担任口译的。

山口守先生来信说，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希望我谈谈我和胡风先生的友谊历史或我在胡风事件中的经历等。我谢谢诸位朋友的关心！那我就在这里随便谈谈，我也希望各位先生在我的讲话中插话或提出问题，我们这个聚会，能成为一个大家的漫谈会才好。

我和胡风先生的友谊，正如前几年我在一篇追悼胡风先生的文章中所概括的：“时代命运的播弄，反而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们夫妇与他一家大小的友谊，就是这么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①

① 《悲痛告别——回忆胡风先生》，《良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香港版；又见北京版《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改题《片断的记忆》。

在一九五五年中国发生了所谓胡风事件后，人们纷纷议论说，贾植芳为什么会和胡风成了朋友？论年龄，他比我大十三岁，他在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是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地域相距几千里，因此可谓非亲非故。我们都算留日学生，他来日本留学的时间比我早，离开得也早。他是因为参加一九二五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后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于一九二九年流亡到日本留学，并在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又因为参加了当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后，于一九三三年被驱逐回国。我则是因为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被警察逮捕关押后，跑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学习，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立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事业。我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留日学生，但都算是政治亡命兼留学，在这一点上则是相似的，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后来成了朋友的根本原因。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虽然许多朋友因我受牵连，我也感到内疚，但是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地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见梅志夫人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胡风先生在逝世前一年为他的论文集（出版时被改名为《胡风评论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1985 年版）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这是他在生死大难之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从而因工作性质关系，从接触一些作家和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开始，到协助鲁迅先生编辑《海燕》杂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在党的有关领

导人冯雪峰的授意下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以至抗战爆发后，他在一九三七年创办《七月》，由上海，而武汉，而重庆，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七月》被迫停刊；一九四五年他重新创办和主编《希望》以及《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文学丛书，在战前和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他编辑文学刊物的关系，在他周围，结集了一批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他从读者中发现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人又成为他的朋友，建立了友谊，以致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胡风派”或“七月派”文学流派，而到了一九五五年却又被打成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看作这个文学流派的作者，这时大多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从这时起，他们的多数在文艺界消失了，失踪了。在他逝世前一年，他在为自己的评论集写的这篇《后记》里谈到和他们的关系时，不无辛酸地又说：“我检查自己，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以致没有割断联系，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对人民（革命）的共同态度，对文艺工作的彼此思想和感情上的交流。”这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发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把这个文学流派，定性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的原因。而我就是他前后所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七月》、《希望》、《七月文丛》的一个撰稿人。

我和胡风先生相识，是通过投稿关系开始的。那正是我来日本上学的时期，我虽然在日本大学读社会学，但我热爱文学，从三十年代初间就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在报刊上投稿，也参加了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所以到东京后，除过上课，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业余仍不放弃文学写作。我生平喜欢逛书店，在东京时期，总习惯地到开设在神田区的内山书店溜

溜,因为它专门经营中国新出版的图书,所以我把这家书店看成是了解国内政治、社会、文学动态的一个渠道。一九三七年初,我在这家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二两本,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员阵容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坚持和发扬鲁迅的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这时期写的以来日本前的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的悲哀》向这个丛刊投稿。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编者是什么人,所以也没有写信。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就收到刊登了我的小说的丛刊第四本《黎明》和三十多元日元的稿费,与编者胡风的热情来信。

从这封来信我才知道这个丛刊的编者是胡风先生,而胡风可以说从三十年代初期他用笔名谷非写作、翻译开始,我就是他的一个老读者了。也就是说,我从他的著作和翻译,早就认识了他,也可谓“神交”已久。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又是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文坛上,属于左翼阵营的革命作家,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忠实助手。我从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写的那篇《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章里,又认识了他的为人的品质,鲁迅先生对他的生活性格和文风的评价。鲁迅先生为他被“四条汉子”轻信转向者穆木天的流言,因而使胡风在政治上受到诬陷鸣不平的话:“胡风耿直易于招怨”,这句话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一九四八年为论主观问题,胡风受到在香港的同一阵营里的同志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他更大规模的批判时,我都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我这种观察和看法,只是皮相之见,并不能概括胡风所遇到的这两场政治性灾难的本质。咎不在他,这在今天看来,是洞若观火的。)同时,也是从这篇

文章,我粗略地了解到在左翼文艺阵营里胡风和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的研究者都说,这就是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那场冤案的历史根源。我在这个历史时期通过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后来成了比较亲近的朋友,因而正是从这时起,种下了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我受到株连的根子。

一九三七年秋,我在抗日的民族战争中回国,投身于社会。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把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我从日本弃学回国后,先是在山西中条山一带作战的正规军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和宣传工作,不到一年,即一九三九年,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第一次政治上的大逆转暗流,我不得不逃离这个部队,辗转到了重庆,我先给胡风寄出一篇稿子《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这是我在山西战地访问一个八路军支队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附言告诉他说,我已到了重庆,被朋友安排在一个报馆里工作。信写得很简单,虽然在这以前,当胡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办《七月》时,我就给他投稿,并成为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到了山西战地后,继续给他投稿、通讯,并被约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